

“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王锐◎著 裕固族
当代文学创作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



王锐，男，汉族，甘肃山丹人，文学硕士，河西学院文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系中国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西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宁夏社会科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参编著作《河西当代文学论丛》。主持过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项目，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河西院校长基金项目 and 河西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先后荣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社科院青年社科成果奖，张掖市社科成果奖，河西学院教学成果奖，河西学院教学优秀奖，河西学院优秀教学研究论文奖，河西学院青年骨干教师，河西学院优秀班主任，甘肃省大学生挑战杯优秀指导教师等多种奖项或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李依璇
☆封面设计：苏金虎



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论

yuguzu dangdai wenxue chuanguzuolun

转眼间，当代裕固族作家文学创作已走过30个春秋。

裕固族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全方位记录和见证了裕固族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努力探寻民族历史文化延续的根脉和遗迹，记录时代革新中族群的生活变迁和心灵碰撞，抒写新时期民族经济、文化呈现的新面貌，深入思考民族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尽情弘扬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多重价值，尝试构建大时空背景下的创作雄心和博爱精神，并使创作最终抵达人类学主题的深刻内涵。

裕固族作家的质朴、热诚、执著和淡定集中了民族精神的优秀品性。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无愧于生活的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民族。

ISBN 978-7-226-04274-8



9 787226 042748 >

定价：38.00元

“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王锐◎著

裕固族 当代文学创作论

yuguzu dangdai wenxue chuanguolu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论 / 王锐著. --兰州:甘肃
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6-04274-8

I. ①裕… II. ①王… III. ①裕固族—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 I207.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033 号

责任编辑: 李依璇

封面设计: 苏金虎

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论

王 锐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316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274-8 定价: 38.00 元

序

钟进文

从文化的传承而言,在古代突厥人时代,裕固族的先祖就有了突厥文、回鹘文,而且拥有了像鄂尔浑叶尼塞碑铭那样的史诗性书面文学作品和敦煌出土的颇具规模的佛经文学作品。不过,裕固族长期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使书面文学未能广为传播。但是裕固族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等。尤其民歌独具风格,曲调朴实优美。有学者认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别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突厥语民歌、蒙古族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其中还保留着一些与《突厥语词典》中记载的四行一段押尾韵的民歌形式相一致的民歌^②,同时又吸收了汉族的小调,回族和东乡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划拳曲等,并且把各种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成为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民歌^③。叙事诗有叙述和歌唱两部分,以唱为主,以叙为辅。在神话、传说中,保留着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观念等诸方面的原始素材。有些英雄传说故事中还保留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古老的母题^④。

① 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81.

② 陈宗振,雷选春.裕固族民歌格律.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487.

③ 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71.

④ Nakludov,S.U: Probleme Folkolora, pp82~89,Moscow.1975.

今天当我们谈论书面文学时，不能忽视这些弥足珍贵的口头文本在裕固族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民歌、叙事诗在一次次重复展演中，传递着族群情感，唤起的是绵绵不断的历史记忆。

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族群文化传统面临快速消逝的时候，人们对此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有些人依然采用本民族最拿手的途径：唱歌——用歌声来展演被主流社会遮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人用烈酒来自我安慰疲惫的身心；还有一批人放下羊鞭拿起笔，用文字来抒发心中的感情和文化的忧伤，由此缔造了裕固族新时期的书面文学。

裕固族书面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1954年开始的。最初的书面文学，主要是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在这一阶段定型，如《黄代琛》、《西至哈志》、《莫拉》等，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学爱好者。

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较完整地保留了裕固族的文化特质，作品风格沉郁、忧伤，充满对故乡的怀念。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及风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后是民歌的改写及文学创作的初步形成阶段，大约在1976至1984年间。如《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等新民歌的形成等。总体特征是由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牧民诗人贺继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是裕固族中最早放下羊鞭拿起笔的牧民诗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创作。他用质朴的语言，真切的笔调描写草原、牧人及他的所见、所感，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民族的新生活。

20世纪80年前后，裕固族文学迎来一个新高潮，虽然是一个小民族在边远山区涌起的一朵浪花，但是不可否认这与当时中国的文学社会环境的巨变密切相关。

从全国范围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经过长时间的封锁之后，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热潮。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介绍，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直接引发了80年代重要的文学运动和

文学论争,如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文学“主体性”和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等。80年代的文学革新和文学“实验”,都表现为“异质”因素不同程度的诱发和推动,由此引起感知内容、方式和艺术方法的新变。20世纪西方的一些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和文学思想,对中国80年代文学的“形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当时的文学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同样也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文化精英陆续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其中一部分人重新回到从小生活的民族地区,用新文学的眼光审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文学自觉”成为当时激动人心的口号,一批文化精英自觉承担起关注民族和民族历史的责任,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成为8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阈、精神意向上的。

巴战龙曾在《铁穆尔的写作旨趣及其意义》一文中对当时裕固族书面文学的兴起做了很好的概括:“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当时的大学生们一方面深刻体验着外国当代作家作品(例如《一日长于百年》、《百年孤独》等)所带来的‘文化震撼’,另一方面又被本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例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小说和散文)所激荡,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学生铁穆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从他后来的作品本身看来,这一社会思潮和阅读经验给这位未来的作家年轻的心灵刻上了至深的‘文化寻根’印记。”

当时的铁穆尔等文学创作之路是“一手伸向大师,一手伸向民间”。一方面深受享有世界声誉的肖洛霍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海明威和我国作家张承志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作家所描述的草原,以及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感情,哥萨克人对马的挚爱,对草原的爱,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包括裕固族)极其相似,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几乎每篇作品

都有古代民歌所营造的文学氛围,民歌是他的重要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全国各地报刊和出版业的大发展时期,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的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刊物)数量与前期相比大大增加,而且地方文联相继或恢复、或新创了属于自己领地的专门刊物,虽然有些地方刊物属于内部交流刊物,但是,这些文学阵地的出现,也极大地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当时张掖和酒泉等地的刊物《甘泉》、《阳关》(全国发行)等积极刊发裕固族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作品,起到了扶持、激发和宣传作用。1993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局编辑出版了裕固族文学作品选《狂奔的彩虹马》(分小说散文卷和诗歌卷)(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新世纪初期,裕固族已经涌现出一批文学爱好者和若干个代表性作家。进入新世纪的裕固族文学不仅向纵深发展,而且稳步走向全国。

经过多年的积累,部分裕固族作家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引起评论界的重视。特别是裕固族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优势,使其作家文学越发彰显出独特魅力,成为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象征。作家队伍日趋稳定和成熟,团队凝聚力和突围精神增强,同族和异族作家间的交流增多,在立足本族文化的基础上,文学创作走向新的突破。

铁穆尔逐渐成长为裕固族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民族文学》、《西藏文学》、《飞天》、《民族团结》、《散文选刊》等刊物频频亮相,拓宽了裕固族作家文学在国内的影响力。散文《牧场谣》获《民族文学》2002年度“龙虎山”杯文学新人奖,散文《杜鹃飞渡》2003年荣获第四届“敦煌文艺奖”。2006年出版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并于2007年和2008年分获“黄河文学奖”和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对其多年来散文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总结,也是作者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该书图文并茂,叙述铺染,气势恢宏,在现

实与历史的重叠交织中唱出了游牧精神与草原文化的挽歌，浸透着对人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执著关怀和深刻思考，是近距离形象感受裕固族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和性格思想的精品。与此同时，玛尔简、达隆东智、苏柯静想、杜曼·叶尔江、巴战龙等一批文学新人也同时活跃于少数民族文坛，时有作品刊发于国家级文学刊物《民族文学》。

2002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联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期刊《牧笛》，成为创作和宣传裕固族文学的重要窗口。2007年，在肃南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裕固文艺作品选》，共分诗歌、散文、小说、歌曲四卷。是在此前两本选集《狂奔的彩虹马》和《裕固族文学集》的基础上，选录了20多年来裕固族作家文学的代表作品（其中还包括生活在肃南地区的部分非裕固族作家的作品），是裕固族作家文学在新世纪的一次总检阅，有力证明了其创作中的无穷潜力和必将拥有的光辉前景。还有不少作家在网络开设个人博客和地方文学论坛，也密切了相互间的联系，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极大方便了本族作家文学的对外宣传。

2004年至2008年是《民族文学》自创刊以来裕固族作家最密集亮相的黄金时期。2004年刊发了杜曼·叶尔江的诗《冬季的雪与夏日的草原》，巴战龙的组诗《在海子湖边》。2005年，刊发了巴战龙的诗《草原深处的风景》和《最后的村庄》（外一首），铁穆尔的散文《腾格里达坂下》。2006年刊发了杜曼·叶尔江的组诗《畅想草原》，巴战龙的诗《牧童乌鲁的哲学思考》（外三首）。2007年刊发了6位裕固族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小说有苏柯静想的《白骆驼》、达隆东智的《猎豹》；散文有铁穆尔的《蔚蓝色的山脉》、巴战龙的《故乡耶尔巴力克的人们》；诗歌有妥清德的《一个人的绿色》（组诗）和《风中捡拾的草叶和月光》（组诗）、贺继新的《家园》（外二首）。2008年刊发了玛尔简的散文《岁月中的牧羊生活》，达隆东智的小说《苍鬃母狼》，苏柯静想的小说《白房子黑帐篷》。

2008年裕固族作家同一年出版6个人作品集：铁穆尔《北方

女王》(甘肃文化出版社),贺继新《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甘肃文化出版社),杜曼《山地民谣》(甘肃文化出版社),玛尔简《海子湖边沙枣情》(甘肃文化出版社),《寂远的牧歌:玛尔简抒情诗歌集》(作家出版社),《我的家园:玛尔简散文集》(民族出版社),可谓硕果累累,异彩纷呈。

2008年,在“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评选中,铁穆尔、玛尔简、苏柯静想、贺继新、杜曼、达隆东智等10位裕固族作家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这是历史上裕固族作家整体获奖最多的一次。《山花烂漫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一文指出:裕固族文学作者在没有先行者提携的条件下,凭自己的文学禀质开掘自己的存在空间,创作出自然与历史感相互交织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结束了没有本民族书面文本、没有本民族文学作家的古老历史。

2009年“全国‘祖国颂’征文大奖赛”中,裕固族作家苏柯静想和贺继新的作品分别获一等奖和优秀奖;在甘肃省第六届“敦煌文艺奖”评选中,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集《北方女王》获文学类一等奖。同年出版的“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丛书”10位作家个人作品集,就有4位裕固族作者的个人作品集。

2010年7月16—17日,“魅力肃南·裕固文学——中国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办。此次论坛由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和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联承办。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河西学院、张掖市委党校等高校的学者及裕固族作家60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与会者对近年来裕固族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今后裕固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此次论坛为裕固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有助于增进裕固族文学创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①。同一年,裕固族又有2名作家(达隆东智、玛尔简)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另

^①苏珊.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举办.中国民族报,2010-8-6.

有铁穆尔 2004 年已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同年,在甘肃省第五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

通过上述梳理,可见裕固族书面文学在近 30 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人类文学史上 30 年是一个短暂的历程,从大历史观而言也说明不了什么,裕固族文学发展的未来走向我们还无法把握,但是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成就和文学价值观进行探索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河西学院的王锐老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裕固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主持了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项目《文化视野中的裕固族口头文本与作家文学》(该项目荣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社科成果奖)。经过三年的积累和勤奋努力,编写出了《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论》一书。该书对裕固族书面文学创作历程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在对作家的创作研究中,作者注重作品精读和多层面、多角度阐释,一方面把文学“史”的影响和作家横向比较结合起来论述,另一方面把重点作家作品解读与文化现象探析结合起来论述,透过个体审视一般,从细微入手研究民族文学现象,同时也指出了裕固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得失,并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该书的出版,对裕固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河西学院的老师能够致力于裕固族文学研究对河西学院来说也有重要意义。河西学院“是甘肃西部和千里河西走廊唯一的普通本科院校”,而裕固族主要聚居在河西走廊中部。近年来河西学院的发展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方面速见成效。例如 2010 年和 2011 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均与裕固族文学有关。目前,中国文学界郑重提出的“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不仅逐步深入人心,而且是一个世纪大课题,其意义在于“建构兼综多民族文学史经验而统摄中华民族文学总体规律的文学史观”。如果河西学院在已有项目基础上,借本书出版之际,在相关专业内开设“裕固族文学”或“裕固族文学与文化”通识课

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论

程,并进一步推进河西学院的河西历史与裕固族文化研究工作,那将是对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和“大文学史观”的重要贡献,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是为序。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1450 室

2011 年 7 月 13 日

钟进文,裕固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

尧熬尔^①文学(代序)

铁穆尔

尧熬尔文学是一个小民族文学,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米兰·昆德拉在谈起小民族文学时说:“……小民族(它们的生活、历史、文化)隐藏在它自己的、令人难以进入的语言后面,很少让人了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在那里有着主要缺陷阻碍它们的艺术得到国际间的承认。然而,恰恰相反,这一艺术之缺陷正是因为大家(评论界、史学、国人与外国人)都把它贴在民族之家的大照片上并不让它走出这个范围……。”^②

王锐老师的这本书正是关于尧熬尔文学的。这位老朋友希望我能就该书的出版说几句话,那么,我还是从尧熬尔人的家乡说起吧。我相信,尧熬尔的写作者们和牧民一样,每天看见的就是眼前耸立的这个悲剧色彩很浓的祁连山雪峰。几十年来眼睁睁地看着祁连山草原在沙漠化,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了我的游牧文化像天边的流星一样消失。有一段时间我满耳都是两千年前匈奴人的那首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歌的背后鲜血四溅、黄沙荡荡。这是死亡的呼唤,是血性的表达,是对人类敲响的警钟。这是那些不知名的草原作家把人所承受的痛苦,那巨大的悲剧注入了这首充满深刻之大美的歌谣中。只有通过杰出的萨满、歌者和诗

① 裕固族自称。

② [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79.

人,天、地和人才能交流,我们才能听到苍天的嘱托,大地的耳语,也只有这样的文学艺术才是有力量的。

这些年,我从祁连山草原和青藏高原到哈萨克斯坦,从兴安岭以东的南蒙古草原到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蒙古草原,看到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命运。草原游牧文化已经成为弱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这些弱者的宗教和文化的歧视不会轻易消失。在没有消除对他人文化的歧视之前,全球人类要做到亲如兄弟姐妹永远只是个天真的幻想。在这里,文学仍然是有力量的。张承志在《四十年的卢沟桥——献给遇罗克的冤魂》一文中沉重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多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

全世界有很多小民族和生活在小型社会中的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时,我常常这样想:在强大者面前,很多小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宗教一直被扭曲和扼杀。如今,很多小民族已经血尽精枯,只剩一个空壳。但是,不管这些小民族所谓的独特文化距离他们祖先的文化有多遥远,不管这些文化在强大的外部力量下,有多少畸形变态、可笑可叹的事,不管他们如何地微不足道,我仍能在这里看到珍贵的生命的突围。他们有自己真正的勇士,这些勇士不仅不亚于那些泱泱大国的勇士,甚至比那些泱泱大国的勇士更配称勇士。这些勇士崇尚他们民族杰出的人物和英雄,而这些杰出的人物和英雄常常是小民族的英雄史诗和创世神话这些文学作品培育出来的,是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无疑是他们的传统文学,通常是口头文学赋予他们的力量。

我自己一直很纳闷的是,在各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中难道没有挽救人类的药方吗?这些年里,我亲身体验了我的先辈们信奉的萨满教或藏传佛教,亲眼看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民族对苍天之神的敬畏和对大地母亲的爱护,而这些珍贵的思想是通过萨满文学(包括大

量的诗、颂词和故事等)传达给我们的,这对当下的人类是多么珍贵。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偏远的祁连山腹地的山谷里,在那些破旧的黑帐篷里,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婆们,往往令人惊讶地怀着对人类苦难的高贵同情心。我认为这也是传统的信仰和歌谣等文学艺术的贡献。

如果追述尧熬尔古代文学的话,从广义上来说,古代北方的匈奴、突厥、回鹘和蒙古的文学都可算是尧熬尔先民的文学。尧熬尔的先辈们先后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他们分别用这文字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那些在鄂尔浑河石碑上的突厥文、回鹘文,那是难得的历史见证,也是优美的文学作品。除了现在还留在石碑上的文学作品和贮藏他处的大量回鹘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外,还有如著名的《匈奴歌》和《乌古斯汗的传说》,北朝时回鹘人的先民敕勒人更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民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古代游牧民族的歌谣是公元546年9月,敕勒部将军斛律金在一次惨烈的战斗结束后所唱的,这就是尧熬尔的直系先民所创作的歌谣。我常常以先辈们留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也不断从这些文化中汲取自信、灵感和力量。

尧熬尔先民自400多年前东迁到祁连山一带时还在使用着古代回鹘文。1957年“尧熬尔社会历史调查小组”的报告中记载,金泉区景耀乡(今大河乡)的安提经高僧和康隆寺的安正虎老人说尧熬尔先辈们使用创自13世纪的八思巴文,用藏语叫“霍尔意格”。据部分僧人们说在1958年前各寺院都有八思巴文的书籍,可惜1958年一把火全烧了。尧熬尔先民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后,在官方和宗教界都使用藏文。当时有部分人用藏文创作过相当数量的诗歌和其它形式的作品,如著名的智华活佛(也称阿库智华,青海支扎寺大活佛,撰有多部著作),他的作品现在仍几乎不为裕固人所知,可在藏语圈内和国